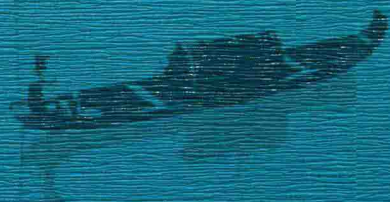


陳尚君 著

星垂平野闊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陳尚君 著

星垂平野闊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星垂平野阔/陈尚君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7

ISBN 978-7-100-14987-7

I. ①星… II. ①陈… III. ①文史-中国-文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021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ISBN 978-7-100-14987-7



星垂平野阔

陈尚君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4987-7

2017年8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张 14.25

定价:58.00 元



陈尚君，浙江慈溪人。1952年生于江苏南通。1977年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1978年考取研究生，师从朱东润教授研究唐宋文学。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曾任中文系主任。现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学术兴趣广泛，尤致力于有唐一代文史基本文献之甄别、研究与建设。

作者主要著作一览

《全唐诗补编》，中华书局，1992年

《唐代文学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陈尚君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全唐文补编》，中华书局，2005年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四库提要精读》（与张金耀等合撰），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敬畏传统》，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唐女诗人甄辨》，海豚出版社，2014年

《转益多师》，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

《贞石论唐》，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我见青山》，文津出版社，2017年

自序

本书为拙著《转益多师》之续集，凡收文二十余篇，以写本师与师祖之几篇为上编，其他几篇有关前辈学者之文字为下编，几篇书评、随笔为附录，皆近几年所作，仍取杜诗一句为书名。

“星垂平野阔”一句出杜甫诗《旅夜书怀》，全诗为：“细草微风岸，危樯独夜舟。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零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前代杜诗注本都认为写于离蜀之初，甚或认为即永泰元年（765）夏秋间，我之所见则异于是。犹记1979年夏初，研究生第一年课程结束，朱东润师出年度作业题曰《大历元年后之杜甫》，嘱下学期开学初交稿，又告，尽量经过自己阅读研究后提出见解，若自己能力不够，沿袭前人说法，也可以给成绩。我知自己资质平庸，读书又少，老师上课有问，罕有胜见应对，故老师对我也缺乏信心。此年暑假，真个大发奋，将图书馆可以借出之杜甫研究著作，皆携归南通，反复比读。突破之重点在杜甫为何离开相对安逸的成都草堂，买舟东下，开始人生新的漂泊。前人虽多有解释，多以为离开在严武死后，我则排比日期，确认在严死前，且从杜甫离蜀后之自述，与唐代检校官制之沿革，知道他在严武幕府初授节度参谋，经严武奏荐，授检校工部员外郎，非虚衔，但也未实授，故得官后即买舟离蜀，拟“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然后入京就官。因中途病重而停滞，错过“瓜时”而未能就职。此点仅浦起龙稍有怀疑，未能成说，我则因听师授课经年，深悟读透史料、独立思考分析对于学术研究之重要，坚持始终，稍得突破。记得师读后，逐字批改，评点时仅说问题挖得很深，有自己见解，只是文句还不够顺畅，偶有错别字，给了较好的成绩。多年

后听王小盾兄告，那几天他刚到校研究生部报到，恰好朱师也在，与人谈对培养学生的看法，他听到的大略是，一直以为经过文革，现在学生水平很差，无法培养出来，但这几天看到交来的作业，看法有了变化，应该还是可以培养的。在这里，我体会到老师的胸襟与眼光。写作业前，已经听过老师在全系以《杜诗的两个高峰》为题的校庆讲座，授课间也多有谈及，知道老师对杜甫的基本看法——那时老师的《杜甫叙论》已经交付印行，书还未出。我对杜甫晚年关键转折的看法，与古人都不同，与老师也不同，但老师并不以为忤，在其间看到我的能力。后来在给我的毕业评语中，特别强调善于从纷繁复杂文献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回到前引的那首诗，在系统梳理杜甫晚年行迹与想法后，我认为应作于大历三年(768)出峡以后，以在江陵前后的可能性为大。“官应老病休”是已然的事实，从诗的内容分析，也以出峡后在江汉平原为近是。如同另外一首诗《去蜀》：“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关塞阻，转作潇湘游。世事已黄发，残生随白鸥。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前人多系于离蜀初，我则认为已到湖南后，若刚离开成都就定好目标湖南，根本无法解释杜甫一路犹豫彷徨、人生无从之失落感。

当然，我以“星垂平野阔”这句诗作书名，只是借用作另一个主题的表达。即在个人学术与人生的成长过程中，老师的作用就如同北斗当空，指引方向，在茫茫黑夜，在人生歧途，都能看到方向和原则。同时，我也感受到，学术也如同写诗一样，虽在父兄，不能以传子弟，再优秀的学生，因为才质、能力、阅历之不同，不可能复制老师的成就。朱师一直鼓励广参百家，力透纸背地读书，决不给我们划定只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回想起来，得自老师的这种精神，真是一生受用无穷。

本书收入多篇谈前辈学术的文章。在我学术起步之初，即大约1979、1980年前后，研治唐诗与文献时，受岑仲勉、傅璇琮两位先生影响尤为巨大。岑先生专治唐一代文献，博极群书，对所有文献都在仔细校比和深度纠谬后再作引用，对基本史料和新见史料的精密解读，深深为我所感佩。认识傅先生时，他还不到五十岁，后追随三十多年，

受益很多,不仅是提携,更多是引领。可以认为,因傅先生的倡导,近四十年国内唐诗研究渐次形成一个流派,即在穷尽占有一代史料基础上,对唐一代文学在历史文化大背景下,作准确精密的解读。在诗文学作品发掘和阐释,文人生平研究,文学事件和文学流派研究诸方面,都能廓清传闻误失,还原真相,改变了前人就诗读诗解诗的局限。今年四月初在京追思傅先生,我以“肇开风气,常存典型”八字,概括傅先生一生学术成就与历史地位。我追随其后,也做过一些工作,近年更感有必要作归纳总结,造福学界,故发愤广徵群书,重新写定全部唐诗,指日成书,欣快莫名。

人生短暂,天地无穷。当杜甫驾一叶扁舟,凌万顷长江,看朗星当空,平野无垠,观月影明灭,大江奔流,虽感人生渐次衰瑟,更悟天人交会,心物无间,人生可为,及时感奋。自念年岁渐增,感怀日新,还历过五,襟抱未衰,追怀前修,表见往迹,不能自己,形诸文字,惜时进取,足为策励,传薪经手,岂敢轻弃,心期如此,读者鉴诸。

谨序。

2017年6月6日于复旦

目 录

夫子何为者 栖栖一代中	001
——纪念唐文治先生诞辰 150 周年	
师友琅琊馆学记	015
朱东润先生研治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历程	032
——以先生自存讲义为中心	
《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校补本)整理说明	051
修补战火烧残的学术	055
《大纲》校补本的新内容	058
《元好问传》新本整理后记	062
元好问的大节	064
朱东润师《八代传叙文学述论自序》附记	068
朱东润师《楚辞探故》未刊稿两篇附记	071
朱东润师《后西征赋》述要	073
唐史双子星中稍显晦黯的那一颗	089
——纪念岑仲勉先生诞辰 130 周年	
瞿蜕园解读刘禹锡的人际维度	103
——瞿蜕园《刘禹锡集笺证》评述	
严耕望先生唐史文献研究方法发微	124
花开花落皆安命 但开风气不为师	137
——悼念傅璇琮先生	
唐代文史研究的典范著作	146
——评傅璇琮先生《唐翰林学士传论》两种	

傅先生著作获思勉奖点评	165
我知杨镰	168
徐松案与清廷反腐	173
汇校全部唐赋的可贵努力	181
——《全唐赋》述评	
他山攻玉 各拥玲珑	204
——《日本唐代文学研究十家》的学术示范意义	

夫子何为者 栖栖一代中

——纪念唐文治先生诞辰 150 周年

他是中国近代两所著名大学的不祧之祖。一所是上海交通大学，曾是中国最著名的工科大学，近几十年建一流综合性大学，稳定保持全国前五，他在建校初期担任校长达十四年之久，为奠定这所大学的学科格局和发展前景殚尽心力。2014 年在他去世六十周年之际，学校在新校区中心广场为他建立铜像，以表敬意。另一所是无锡国学专科学校，是我国第一所以弘传国学为办学宗旨的学校，培养了无数大师级的学者，为传统经史子集之学的传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从该校始建到结束，他始终是校长。虽然近年热谈国学，但这所学校始终没有恢复起来，只有在旧址所建茹经堂保留少许旧迹。他几乎可以说是传统旧学最后的古文家和理学家，为探寻孔孟学说的本旨努力终身，他的学生都称他夫子或老夫子，当年曾有海外人士建议孔庙应以他陪祀，那时他还健朗着。他是前清高官，本可以安享晚年，但始终为办学忧心焦虑，孜孜矻矻。到抗战军兴，他虽年过七旬，双目皆盲，但仍带领全校同学内迁，漂泊道路，饥寒交逼，仍弦歌不辍。“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唐玄宗写孔子的这两句诗，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写照。

他是唐文治，字颖侯，号蔚芝，室号茹经堂，晚称茹经老人。他于同治四年（1865）旧历十月十六日生于太仓州，今年恰好是他诞辰一百五十周年。我的老师朱东润先生是他光绪、宣统之间曾授课的小学生，曾得到他的古文阅读和写作的指导，也在学业困顿之际得到他无私的资助。在我读研究生期间和毕业工作以后，朱先生曾许多次谈到

唐先生对自己一生的影响。我当然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唐先生,但因为这一机缘,觉得应该就自己所知,写一些文字以为纪念。

唐先生于我为师祖,下文为行文方便,直呼其名,识者谅之。

今人喜欢将古人一生分几个阶段来叙述,就唐文治来说,可以很清晰地分为四个阶段,即从出生到28岁进士登第,为求学应试期;从28岁到42岁为居京为官期;其后十四年,为主政交大期(校名确定在他去职后);56岁后为主持无锡国专时期,其间双目皆盲,仍著述不辍,直到90高龄辞世。

太仓于明清两代文教鼎盛,唐文治自幼即习举业,然尤服膺本地先哲陆桴亭(名世仪)之学说。十五岁应童试,十八岁中举,二十岁进南菁书院治经,后四应礼部试,二十八岁成进士。其早期经历如此,学术兴趣也皆在宋明理学,制艺古文。如果天下升平,波澜不惊,他或许会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为名臣,为儒师,经纶世务,究研坟典。然而他却身处三千年未有的剧变时代。就在他登第后两年,甲午海战大败,危及津沽,他有“设有不测,吾当投繯以报国”的准备。越两年戊戌变法,他虽因官低而未及祸,却目睹恩师翁同龢被开缺回籍,诸多师友遭受波及。庚子国变期间,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兼户部纂修官,因而得以接触对外交涉之核心机密,深切知道外交之屈辱与国事之颓唐。从拳乱到八国联军入侵,他都亲历,看到慈禧太后之依违颠预,权臣之构陷误国,而他的直接主官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公忠体国则惨遭斩首。其后与各国议和的谈判,他作为户部侍郎那桐的助手,及那桐任日本国专使的随员,同赴日本,代那桐作《奉使日本记》,看到“日本立国,大抵兄英师德”,“壹意整理海陆军及工商事宜,駸駸乎日臻富强”,“厂肆林立,轨道四达”(引文见《茹经先生自定年谱》),大大开拓了眼界。其间他曾发愤学习俄文,因为用眼过度,埋下病根。到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以三等参赞的身份随固山贝子载振赴英贺英王乔治三世加

冕,因英王得病,加冕礼再三延期,英方尽展本国之所有以为款待,此后又曾游历比、法、美、日等国,接触层级高,参访时间长,得以充分了解英国与西方现代文明之各方面所长。其间他代载振所撰考察游记《英轺日记》,不仅是近代考察西方社会最重要的记录,也以大量细节具体记录他对西方制度和现代建设之认识。如云欧洲全境为国数十,皆曾有猜忌仇怨,而今则“如历法也,学堂也,兵制也,轮船也,铁路也,银行也,商务也,邮政也,皆其同焉者也”,这些善政中,“历法纪年始于罗马,学堂程课、铁路置轨始于英吉利,汽船行海、舟师出征始于美利坚,银行规制始于荷兰,航海通商始于葡萄牙,邮递印票始于法兰西”,可以说创始于不同国度,但“一国为之倡,而各国相继效法,精益求精”,“群相推演,万国同风”,“无有彼此畛域之界,更无有猜忌仇怨之情”。即中国要想进步,必须学习西方的现代文明,绝无他途。从度量衡制到国会政治,从医院设施到学校规模,无所不及。甚至乘火车出行,在燃气机车的轰鸣中,他都在思考:“西人于火车轨道既测地平,更取直线,每过山阻则穿山通道,以砖石环其上,如桥形,其开时工本虽大,而行车直捷,惜时省煤,积久计之,所省甚巨。其行事通盘筹划,以羨补不足,大率类此。”其设计之周到,施工之讲究,看似投入巨大,其实长久获益。对学校之考察更仔细,记录全英有大学六十七所,中小学三万多所,教师十四万人,大学生三万多人,中小學生五百五十五万人,全年官学费英金九百七十三万磅,还详尽记录各类公益学校和技工学校之情况。他参观英京大藏书楼,看到楼中书架累长达三十二英里,庋藏各国古今图书达三百多万种,其中东方书籍分中、日两大部,中国古籍虽不尽备,但已有十之七八。他看到法国新定学校章程,不准男女教会人员担任教席,感慨“法人以宗教立国,然近时重学轻教如此”。而他记载比利时国王虽年已七十,仍步行答礼,带着参观其起居书房,“共楼五大楹,图书满架”,问及中国学术,“研求精细,君主而不脱书生气”。见到日本明治天皇,“威仪整肃,语言不多而均中窾要,洵英主也”。这些都引起他对中国去弊图强之道的思考。归撰《英轺日记序》,认为“繄惟中国,力谋自强,方今官守其度,士劝其学,工农商师

讲于野,兵技巧家兴于军,百废举厥,作事谋始,日积而月累,固将月异而岁不同”,即如能举国以西方为师,发奋图强,积以岁月,中国仍可以有强大的希望。他所历举现代社会建设之诸要务,特别称许保存本国文明与实施大学教育之举措。阅读这些记录,可以说他在南洋公学期间之施为,此时已在思考,后之一切努力,皆着眼于此,无愧为具有世界眼光、立足于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之教育家。

出访归国后,唐文治于次年补和会司员外郎,寻补庶务司郎中,再进商部右丞,再晋左丞,一年四改官,重要原因是得到商部尚书载振的信任和赏识。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授商部左侍郎,在工部归并后为农工商部,仍为左侍郎,一度曾署理尚书,达到他任官的巅峰。在这三四年间,他“始终是商部的的主要主政者,实为商部领导层之核心”(王奎《清末商部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其间他有许多重要的建树,一是建议设立商会,先设总商会于北京、上海两地,再在汉口等处逐次推广,目的在求“通商情,保商利”,加强商人间的联络与信任。这是中国有商会之始。二是编订《商律》,以“保护商民,体恤商艰”为原则,确定商业行为的准则与国家对商人利益的保护,主张施行相对自由宽松的经济政策,保障商人利益,促进贸易发展,为我国有商法之始。三是建议逐步推行金本位制,改变银本位制造成的国家受损局面。四是制定商办铁路政策,吸引侨商财力筑路,在他去职后路政归邮传部,认为有利可图而将路权收归国有,激起保路风潮,为清亡之前奏。唐晚年言及,仍感慨不已。五是鼓励商人、工匠积极参加世界博览会,由朝廷给以扶持鼓励(参朱恺《从〈英轺日记〉看唐文治“旧邦维新”观》,刊《四库文丛》第一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尽管当时国步维艰,百废难举,局部的建设难以改变国势之急坠,但唐文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了自己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二

国内四家交通大学,上海和西安原本是一家,前身是1896年盛宣

怀奏请建立的南洋公学,到 1907 年唐文治出任该校监督(校长)时,该校的正式名称是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稍早些时的校名是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也即是唐主部政时的下属学校。唐出主校政,则因一系列意外事件使然。在他以前,学校已经成立十年,监督换了十人,大多挂名而并不到校视事。是年年初,唐因母亲去世而守丧,当时官场仍维持守孝三年的习惯,即在双亲去世时要离职二十七个月以尽哀,当时的变通则其间可在官办学校、实业任职。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因部务繁剧,以唐为左右臂,建议他去职数月后即复职,是为夺情,唐已应允。不料其间发生杨翠喜案,新授黑龙江巡抚段芝贵以重金买名伶杨翠喜贿赂载振以求官,事被媒体揭发,载振引咎辞职,唐也免了夺情复职。因觉得上海离太仓较近,方便照看老父,乃同意出掌校政。

唐文治主校十四年的成就,是交通大学校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已有无数论说加以归纳总结。我是局外人,无从置喙,归纳前人之所见,可举百度百科“交通大学”内容来说,唐文治“连续掌校十四年,他将学校改办成工科,先后设立了铁路专业、电机专业和铁路管理科,聘请了一批高质量的中外籍教师。在结合中国实际基础上,从学制、系科设置、课程设置、教材、教学环节、体育运动等方面,全面地引进国外的先进经验,直接采用美国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大学等著名大学教科书,使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成为中国南方乃至中国高等工科院校的楷模,形成了近代工业大学的格局”。我无从复核这一叙述的准确性,就此来说,在 100 多年前能以如此世界眼光来办学,无疑超越了一个时代,如果要找原因,是他访问英、美等国时积累的认识,清醒看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需要在实践中努力加以改变。

他一到校即认定“办理学务以筹款为第一要义”,首先咨文邮传部落实常经费,即“轮电两局岁捐银十万两”,同时充分利用熟悉朝廷财政和曾在官场的人脉优势,为学校多方筹措经费,如建议从京奉、京汉两路余利下为学校增拨经费;建议为江、浙、闽、粤四省每年培养学生四十人,各省酌拨经费支持学校;将学校许多积年旧账理清,如汉阳铁厂老股盘活等。他曾任户部北档房总办,为全国财赋总汇之区,知

道朝廷哪些门路可弄到钱,加上又曾主管商部,人脉广泛,恰可为学校所资用。

经费充裕,得以设立一系列学科,唐文治到校次年即新设电机、邮政两专科,又设国文科,并逐渐完善专科、中学和小学系列,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序列。又出重金聘请西人教员,并逐次将本校学生送出留洋,逐渐增加留洋归国者到校任教。在得知美国庚款将每年提供100位华人学生留美机会后,唐文治在学校立即公布消息,并往上疏通,争取名额。经过选拔考试,首批赴美学生47人,上海实业学堂有14人,占三分之一弱,可见他鼓励学生走出去的努力。

唐文治出主实业学堂是因为居丧服忧,三年期满,他即申请起复归朝,这应是循例的安排,但被以学校亟需整顿“商留”,原因不明。次年即为辛亥,10月10日武昌首义,11月3日,上海光复。6日,唐文治宣布实业学堂更名为中国南洋大学堂,要求“本校师生员工要以坚定毅力维护新中国”。6日,带领全校教职员和学生在学堂运动场剪辮。11日,列名通电要求清廷逊位。13日,致书沪军都督府就扩充军队和筹募军饷提出建议。同时,撰《中国改革建设政体论》提出建议。可以说,唐当时身份虽然还是体制内官员,但在第一时间内参加了推翻清廷的行动,对此,他的老师王祖畬、沈曾植对他深致不满,作为儒家道德的捍卫者,他们的立场是一致的,但在大革命洪流中,唐的选择是为国家谋前途,不为一姓守江山。他在晚年自述:“人才不用,国运尽矣,欲保全皇室,不得不出于此。”“俄国革命,俄王尼可来不从,为国人枪毙。孤臣耿耿之心,当可白于天下后世矣。”唐在清廷为官,得到那桐、载振等满大臣提携,他也曾多次得到慈禧单独召见垂询,晚年自撰年谱,仍感念恩礼,慈禧去世后他在上海道署“哭临三日”,自述“感念恩遇,曷胜痛悼”,但也感叹“恩礼如此,使臣工仆仆亟拜,曷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为愈乎!”英、比、日诸国君臣同心,改良政治,谋求富强是他曾见到的,而现实经历总使他失望。“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孟子的古训,唐文治实践了这一主张。

民国肇建,官办的学校需要得到新的支持,他在袁政府成立次月

就赴京筹措经费,确定了归属交通部的定位,改易校名,然后多方奔走,寻求支持。虽然当时请他出任工商总长的呼声很高,但他认定惟教育为国本,继续在学校任职,在时代剧变中保持了学校的发展。1917 他年在学校成立 20 周年纪念会上说道:“最难堪者,改革之际,经济困迫,彼时今日不知明日,本月不知下月,本学期不知下学期,诸生相对凄惶,至今思之犹堪坠泪。”“鄙人接办此校以来,中央议裁小学者三次,议裁中学者二次,议归并土木科者二次,议裁电机科者一次。每当议裁议并之时,鄙人之心摇摇如悬旌,每念及诸生被裁后未知往何处读书,各父兄家属更不知若何忧虑。对于诸生未便宣布,而笔舌力争之余,亦几经下泪,故今日对于诸君子不觉喜极而悲。幸赖大部(指交通部)始终维护,并赖社会诸君子及旧同学互相辅助,尤赖有盛杏荪先生从前积有基本金,稍可支持,卒能转危为安。”这些应都是实情,许多交涉也都有原始文件记录。盛杏荪即盛宣怀,不仅是南洋公学建校的奏请人,且因学校建立之初,即由他主持的招商、电报两局“捐集解济”,将商户捐款悉数投入公学,为学校准备了充裕的基本金。以往仅取利息,在民初艰困时动用本金,得以渡过难关。唐文治说上面一席话时,盛已去世。在今存盛档中,有大量两人通信,绝大部分是唐主校政期间致盛函,虽大多属于琐事,但可以看到两人君子相交、互携奉公的风范。其中涉及较多的,一是学校经费之筹措和兑现,二是彼此各有人事之请托,三是为学校发展向盛谋求支持。如 1911 年 1 月 16 日信告徐家汇学生宿舍因招生数量增加而住宿紧张,因发现对面民居是盛家产业而请盛出让,改建为宿舍;同年 2 月 24 日又看中“尊府丝厂及余屋基地”请售归本校;1914 年 6 月两函则因盛介绍其侄孙入学,唐告必须如期来校报名考试,再考后知其英文太差,不宜入中学,只能先入小学;对盛推荐的西医人选,则以“校中经费万分支绌”为由婉拒;甚至学堂师生 120 人旅行赴苏州,唐请借宿盛府留园,盛则为安排到阊门外陈列所。从清末到民国,他有大量奏章和信函记录他为谋求学校发展所作之努力。

陈平原教授著《中国大学十讲》,特别将无锡国专列为一章,对唐